

【新质生产力研究】

DOI:10.15986/j.1008-7192.2024.04.008

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透视新质生产力的伦理向度

侯晓丽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6)

摘要: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坐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构成了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内在伦理向度和生产力发展质态的价值旨归,蕴含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关切。关联于对古典经济学理论本质的揭露,经由对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国民经济学生产力理论唯灵论本质的批判性超越,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创立了科学生产力理论,并将生产力发展置于伦理现实关切的维度,阐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是生产力发展的价值旨归。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对生产力概念伦理内涵的强调和对生产力发展价值旨归的阐释构成了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目标的理论根基和思想根源。在百年大变局的历史语境下,新质生产力作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的理论坐标,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为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

关键词: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财富;新质生产力;伦理向度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4)04-0058-10

一、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出场的理论背景

生产力原本是一个古典经济学概念。根据已有文献,最早明确使用生产力概念的是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魁奈。在 1757 年为百科全书所写的“谷物”条款中,魁奈从农业角度展开对生产力理论的研究和阐释。不同于魁奈将农业视为财富的唯一源泉,将生产力仅限于土地而无视劳动,1776 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①集大成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释了劳动^②和生产力之间的本质关联,改造了魁奈对财富的理解,将魁奈财富图景中的“农民、地主和手工业者”置换成“工人、资本家和地主”,提出了劳动生产力理论。1817 年,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继承了魁奈“土地生产力”观点和亚当·斯密“劳动生产力”概念,将劳动者、机器、土地等生产要素通过生产力概念联系在一起,并将生产力作为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尺度。纵观古典政治经济学话语体

系,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生产力概念始终保持在物质生产的单一维度。

19 世纪 40 年代,在内生动力牵引和外力强势催逼下,生产力概念进入了德语语境,并被赋予了德国文化独有的精神维度。19 世纪 20 年代,带着强烈的德国问题意识,直面莱茵河对岸浓烟滚滚的工业文明和作为其存在合法性支柱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通过对劳动和生产力范畴的哲学审视,明确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通过劳动实现的,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是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1]285}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斯密和李嘉图把“劳动一般”看作是“财富的本质”,那么,黑格尔则在思辨哲学的高度,通过对劳动和生产力范畴一般规定的科学考察,把劳动看作是“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然而,黑格尔所推崇的劳动其实是精神劳动,导致其关于劳动和生产力的理解都被封印于神秘主义的洞穴,直白地敞露着德国哲学的伟大和可悲之处。1843 年舒尔茨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批判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精神的创造力未给予足够重视,明确指出:“在最根本上,人

收稿日期:2024-04-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21BKS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马尔库塞社会批判思想的生态面向及其现实启示研究”(XJSJ23077)

作者简介:侯晓丽(1982-),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

E-mail:244462379@qq.com

的精神是大地之上最本真和最真实的原初产品,它将所有生产的材料(den stoff aller production)不断地占有,并将其不断地构造为(gestaltet)新的材料。”^{[2]9}通过对精神创造的作用和社会结构规律的考察,舒尔茨创造了生产力概念的德文写法^③。1843年底到1844年初,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中从主体性的共同交往活动来理解生产力,在赫斯看来:“生命(leben)是生产性的生命活动(productive lebensfähigkeit)的交换(austausch)……他们的现实生活只是在于他们的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只是在于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只是在于同整个社会身体的联系。”^{[3]137-138}1837年,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中,以“生产力理论”这一明确的称谓和标题来概括他经济思想的核心。1841年,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 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关税同盟》(以下简称《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李斯特经由对德、英、法、西班牙等国的经济发展史的详细梳理和历史回溯,批判性地揭露了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财富观的理论局限性,称其为“空洞的世界主义的经济学”,通过将生产力概念在学理上系统化,将精神要素纳入生产力的解释框架,李斯特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生产力概念为核心的国家生产力理论,而该著作也曾一度被视为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宣言书”。

综上,在德语语境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概念被赋予了与“人的自我确证”“人的能力发展”等精神维度,构成了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形成的历史语境和理论背景。从思想脉络上看,马克思首次遭遇生产力概念是在1843年至1844年的巴黎笔记中,1845年3月,他写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手稿,将批判的矛盾直指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思想局限性和现实危害性。

二、马克思对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双重批判及其现实指向

19世纪40年代,相比较于依托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已然崛起并展开全球殖民扩张掠夺的英国和法国,德国的现状可以“四分五裂、积贫积弱”来形容。面对英法的强势崛起和迅猛扩张,“德国资

产阶级如何在国际竞争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发展壮大并增强国际竞争力”是李斯特国家生产力理论设定的思想动机和现实关切。

1. 马克思对李斯特生产力概念理论本质的揭示

李斯特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尽管先提出生产力概念,探讨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但却有明显的理论局限性。首先,囿于研究视域的局限和研究主题的狭隘,古典经济学仅关注于交换价值,而不考虑政治和国家的力量,导致其“混淆了财富本身与财富形成的原因”,表现为“将物质财富即交换价值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而生产力仅被当作交换价值的一个附属因素顺带提及”。重新定位了财富和生产力的关系,李斯特明确指出,生产力是树,财富是果实,因此,“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4]47}。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国财富力的根本源泉,“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4]118}。其次,李斯特指出,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把体力劳动当作“唯一的生产力”,明显是“不懂得生产力的思想内容”。实际上,“不仅体力劳动是生产性的,而且维持法律与秩序、培养和促进教育、宗教、科学、艺术的人的精神劳动也是生产性的”,也就是说,“那些养猪的和制丸药的当然属于生产者,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师、作曲家、音乐家、医师、法官和行政官也是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性比前一类要高得多。前者所生产的是交换价值,后者所生产的是生产力”^{[4]127}。最后,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是李斯特思想的真正目标,李斯特把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国家的政治力量,并将生产力的发展确立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和依据。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马克思揭露了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三重局限性:第一,马克思认为,囿于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视域和德国落后的现实处境,李斯特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古典经济学理论局限性形成的现实根源。在马克思看来,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的确不能完全等同,但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制度本质上是“间接的自我出卖的奴隶制”,在资本主义工业制度下,一无所有的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身的

劳动力,而这种貌似“自由自愿”的主动出卖最终导致工人被物化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特殊商品”。这种残酷的现实反应在古典经济学实证化的理论中,就自然会被直观地表达为:人力与水力、蒸汽力、马力作为力量来源等同视之,由此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资本的本性。第二,在马克思看来,李斯特将交换价值与生产力分离,将生产力以唯灵论的形式进行美化和推崇,将求富的目标伪装成对“人类至善”和“个人才能发展”为目的的崇高的国家生产力,这显然不仅不是对古典经济学局限性的超越,反而恰恰说明他根本不懂得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不懂得生产力和私有制及私有财产的关系,不懂得古典经济学理论局限性的现实成因。第三,囿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李斯特的国家生产力理论不仅会导致现实中的灾难和苦难被掩盖,也会导致将工人贬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弊端误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进步象征并给予“赞扬”。批判并超越了李斯特生产力概念的理论局限性和现实危害性,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与交换价值的关系是无法割裂的,“在现代制度下,生产力不仅在于它也许使人的劳动更有效或者使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更富于成效,而且它同样还在于使劳动更加便宜或者使劳动对工人来说生产效率更低了。因此,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5]263}。经由上述剖析,马克思给出明确论断:李斯特国家生产力理论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不仅没有超越后者的局限性,反而是一种研究观念和方法上的倒退”,其现实关切不是德国人民的富裕自由,而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2. 马克思对李斯特国家生产力理论现实利益定向的揭露

英国在18世纪60年代就已经发动工业革命,19世纪初法国展开了工业化的浪潮,而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才开始了工业革命。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泄露了资本来到世间攫取利润和财富的秘密:无节制地掠夺、支配和征服自然资源;对内奴役工人阶级,对外展开殖民掠夺。资本之恶的公开敞露使刚登上历史舞台,想步英、法资产阶级后尘的德国资产阶级失去了冠冕堂皇发财致富的理由,“如何才能在这种不利处境中光明正大地把把世俗的交换价值装满自己的口袋”是李斯特国家生产力理论真

实的理论重心和现实定向。

首先,李斯特指明并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混淆了财富的原因同财富本身”的理论局限性,提出要用唯灵化的“生产力”概念取代静态的物质财富观。根据李斯特的国家生产力理论,“生产力是一种神圣的国家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是一种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精神性的‘上帝’般的存在”。因此,德国资产阶级与英法资产阶级不同,他们所追求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具有精神本质的“无限的生产力”,“是以发展个人才能为目的的高尚的生产力”。经由李斯特国家生产力理论的美化,交换价值由目的变成了手段,生产力由手段变为目的,德国资产阶级在这种幻想的、理想化的词句下借机“把世俗的交换价值装满自己的口袋”。

为了彻底揭穿李斯特生产力概念的理论局限性和现实危害性,马克思向李斯特发出了直指灵魂的质问:“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5]261}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将人力同水力、蒸汽力、马力等而视之的观点本质上是对人的敌视,那么,李斯特生产力概念却赋予资本家一个新的特权即“合理合法地将工人与机器、牲畜的生产能力相提并论”,根据李斯特的国家生产力理论,“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5]261-262}。在揭露李斯特国家生产力理论局限性和现实危害性的双重维度上,马克思指出,李斯特生产力概念与同时代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执迷的“人的本质”概念一样,其本质不过是经济学领域内“一块盖在金钱之上的遮羞布”,不仅掩盖了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也掩盖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残酷的剥削。李斯特对古典经济学看重物质财富的批判和对精神生产力的强调并不说明他所代言的德国国民经济学比

看重财富的古典经济学家更高尚,却恰恰反映出其虚伪本质,“他追求财富而又否认财富。他把无精神的唯物主义装扮成完全唯心主义的东西,然后才敢去猎取它”^{[5]240}。

其次,李斯特试图阻断英法老牌资本主义以实力抢德国资产阶级饭碗的可能性。李斯特早已洞穿了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提倡在国际市场上开展自由贸易的现实动机,在他看来,“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实行普遍自由贸易的结果是不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的,情形将适得其反,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4]112}。为防止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英法大量廉价商品冲击德国市场,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致力于探究如何增强德国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竭力反对竞争和自由贸易,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保护关税,在把外国工业品排挤出德国市场的同时,使外国工业因市场收缩而造成的“过剩工人、才能和资本”流入德国,在德国找到出路,促进德国工商业的发展。基于对李斯特生产力现实利益指向的透视,马克思明确指出,李斯特阻断英法老牌资本主义以实力抢德国资产阶级饭碗的可能性并不说明他的国民经济学所关注的是全体德国人民利益,而是因为李斯特清楚当时的德国工业还没有进入到英国工业那般的强盛阶段,落后的德国资产阶级“既想在国内发展竞争和商品交换,又不想与外国资产阶级展开竞争和贸易;既想在国内剥削工人,又不想受国外资产阶级的剥削”^{[6]120-121}。因此,一旦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壮大到足以与英国法国相匹敌,德国迎来的绝不是国家富裕安宁,人民幸福自由,而是德国资产阶级为了利润对本国工人阶级更深的奴役和剥削,马克思犀利地将李斯特这种“无耻地泄露了财富的秘密”而不自知的行径比喻为“狼作为狼同它的狼伙伴有同样的利益”^{[5]251}。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盎格鲁—撒克逊式经济学)几乎垄断了人类观察经济现象和理解经济问题的思维方式、话语表达和想象力空间的历史境遇下,以李斯特国家生产力理论为代表的德国国民经济学深刻地表达了德国思想界在直面英法资本主义强势崛起和急速扩张的外力挤压下对落后德国政治统一和经济崛起的现

实关切和理论引领。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这种貌似救赎的理论囿于其无法挣脱的思想和现实局限性,最终不仅在理论上无法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现实中也必然会将德国人民引至资本灾难更黑暗的深渊。由此,马克思对李斯特唯灵化生产力理论的批判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有紧迫的现实关照。1845年初,马克思从巴黎移居布鲁塞尔,展开了对现代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工业制度之间本质联系的深度研究,提出了科学的生产力理论。

3. 马克思科学生产力理论的创立

因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脉络,从科学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到生产力发展质态价值旨归的定向,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进程。

首先,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背后的非伦理、反生命本质。马克思认为必须把生产力和交换价值、私有制工业联系起来,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中把握生产力,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生产的现实角度去理解生产力。基于对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共谋的历史唯物主义洞悉,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原本体现人们创造力的物质生产劳动在其资本实现进程中表现为“异化劳动”即“人们在从事生产劳动过程中投入的体力和智力越多,其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也就越大,而它自己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随着物的生产吞噬了人自身的生产,“对象性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即对象转归为异己力量”^{[7]168},最终,工人劳动所创造的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7]580}。而一旦社会劳动所创造的生产力与从事劳动的个人力量相分离、对立,必然导致这样的理论直观:(1)生产力并不是人的力量的展示,而是分工的力量、机器的力量、私有财产的力量。(2)作为生产力来源的生产劳动不是人的力量的展示,而是对人的力量的否定,是一场“瘟疫”。(3)生产工具、分工、所有制是无法抗拒的主宰生命的外在力量。(4)社会劳动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是一种统治人们的,不受人们力量所支配和控制的,使人们的愿望不能实现,使人们的打算落空的“破坏的力量”^{[7]542}。

其次,夯实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坐标,提出科学的生产力概念。经由并高于黑格尔哲学和德国国民经济学,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直面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透视李斯特唯灵化国家生产力理论的思想局限性和现实危害性,马克思将生产力拉回社会现实中,提出了科学的生产力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创造生产力的不是鲁滨逊式离群索居的原子个人,也不是德国哲学基础上唯灵化的“精神”或“唯一者”,而是从事生产劳动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个人”,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8]11}。通过强调“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生存方式与工业阶段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夯实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坐标,在社会劳动的基础上对生产力概念给出了明确论断:“一定的生存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7]532-533}

最后,全面批判和扬弃历史唯心主义洞穴中的形形色色的生产力理论,指明生产力发展的未来之路。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唯心主义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国民经济学共有的理论局限性,如果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局限性在于其仅是对客观现实的描述,表现为“混淆了财富和财富的原因”,那么,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的局限性就在于其将“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混为一谈”^{[5]259},未能区分工业及其产生的力量之间的辩证关系,导致生态危机、环境危机、经济危机和工人阶级苦难的真正根源被掩盖和遮蔽。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含蓄而创造性地引用了歌德1797年著名的Der Zauberlehrling中“魔法师、魔法、魔力、失控的魔法、咒语召唤的力量”的隐喻来形象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工业唤醒的力量以及二者之间“失控”关系形成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与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资产者无非把它们看作是实现他

自私(肮脏)的利润欲的工具(承担者);明天,它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会是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时的人类核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为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5]258-259}基于上述可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是以赢得利润为唯一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无意识地并违反自己的意志而造成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狭隘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去控制的。除了“隐藏在社会劳动中的巨大生产力”,资本主义工业还“召唤”了一个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5]251}由于无产阶级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和巨大的生产力却只能为自己创造了贫困和不幸,所以为了自我解放和救赎,必须担负起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掘墓人”的历史使命。基于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私有制狭隘的生产关系根本无法容纳和控制其用魔法召唤出来的两股巨大的力量,其自我持存的方式和自我续命的手段^④都无异于饮鸩止渴,“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9]278}。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直接生产过程中所内含的矛盾必将会迫使其走向自己的反面,而沦为资产阶级获取财富手段的无产阶级终将“砸碎自身的锁链,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的工业一起炸毁”^{[5]258-259}。

综上,历史唯物主义清醒的理性自觉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悖论性发展的生产力和蕴含在社会劳动中的社会生产力有着清晰的理性辨析,经由对资本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审视,马克思明确指出:“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10]405-406}尽管对资本生产力所造成的灾难和危机马克思早已了然于心,但他从未堕入“解释世界”或“掩盖灾难”的历史唯心主义洞穴,也从未对现实表示失望或绝望,青年马克思在伊壁鸠鲁哲学所青睐有加的“生活在必然性中,却勇敢追求自由”^⑤的“偏斜的原子”伴随着其思想的成熟逐渐成熟为其

科学生产力理论内嵌的价值坐标。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共产党宣言》到《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极限的深刻洞悉和对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以及对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过程中的把握,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不是现代文明的终极宿命,而是‘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存在,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11]49},随着财富的基础和源泉发生质的变化,‘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2]101}。一旦‘资本历史使命已经完成’^{[13]286},‘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将成为未来生产力发展的价值旨归。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热情洋溢地写道,在未来新社会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12]104}。

作为融合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有机整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坐标,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生产力理论在理论和现实的双重维度回应了现代性的根本难题,揭露、扬弃、超越了资本逻辑下财富与自由相悖的生产力发展逻辑,泽被后世,历久弥新。

三、新质生产力: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彰显

19世纪80年代,伴随着资本之恶在全世界的愈发猖獗,无产阶级革命得到了迅猛发展,与之相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在工人运动中主导地位的逐步确立。面对革命形势的风起云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们掀起了形形色色的意在于诋毁、歪曲、打压、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的浊浪,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坐标的生产力首当其冲。

1.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历史遭遇

坚守、捍卫、夯实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坐标,将生产力概念的内在伦理向度和生产力发展质态的价值旨归定向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贯穿于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始终。马克思逝世后,在更为复杂的历史形势下^⑥,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坐标的历史任务直接落在恩格斯的肩上。1890年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巴尔特在其《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中把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妄图将历史唯物主义打回“敌视人”的“机械唯物主义”牢笼;不久,被恩格斯称为“凶兆之鸟”的摩里茨为这本书写了《现代德国对黑格尔的侮辱和迫害》书评,两个人一唱一和借用哲学史攻击唯物史观理论。1890年8月到10月,基于理论斗争和现实革命的双重需要,恩格斯着力批判了“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局限性和现实遮蔽性,他这样写道:“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14]613}在晚年的几封著名书信中,恩格斯进一步对经济决定论的猖獗进行了更为深刻和冷静的反思^⑦。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普列汉诺夫提出“生产力一元论”^⑧集中力量反击“经济唯物主义”,但他当作思想武器的“生产力一元论”却被西方一些学者指责为“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了‘工具—技术决定论’”^{[15]23}。俄国十月革命后,为了解决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时代任务,列宁从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着眼,强调了生产力发展与人民对摆脱贫困、实现美好生活期望之间的内在关联,把“生产力的发展”称作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在列宁看来,“贫困、饥饿、挨冻和一切苦难都是由生产力不足造成的”^{[16]141},因此,“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的根本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17]369}。列宁去世后,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给出了生产力的概念,并写入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权威来源,其影响不仅限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波及到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诸多领域。

2.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遭遇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在僵化模式的任意切割和多重程式化解读下被“简化为技术的进步”“工具

和技术导出的‘能力’”“劳动和劳动工具的技能”等“物”的力量,堕入了“人学空场”的绝境,湮灭了其因对人的现实性、主体性、创造性地关注而独有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伦理向度。由此出发,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的理论立场刻意地避开了经济学,创造性地解读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将生产力理论的关注点投注在“人本身”,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理论代表和理论成果,却也敞露出其矫枉过正的理论裂缝。20世纪70年代,宣称“以重建、捍卫和修正历史唯物主义”为其宗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陡然兴起,作为该流派代表人物的科恩在其《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宣称“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知识或智慧发展的结果”^[18],试图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进行全面的辩护。经由分析哲学“普罗克鲁斯忒斯的床”的切割,马克思科学生产力理论中人的因素和伦理向度被强行割除,绝对性地凸显了技术的决定性作用。正如乔治·莱尔因所说:“到目前为止,科恩对‘传统的技术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作了最引人注目的捍卫。”^{[19]61}另外,由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坐标的生产力概念被困在“经济唯物主义”“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桎梏中,导致与其相关的“自然”概念被空间化和无意义化,沦为无生命、无意义的廉价或免费的物资资源。在这种错误自然观的笼罩下,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环境运动中沦落到“失语”“空场”“缺位”的尴尬境地。这种窘迫的状况直到70年代马尔库塞创造性接续和拓展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反生态、反生命本质的睿智洞见,提出系统的生态解放理论,才开出一条生态马克思的新道路^{[20]185-227}。除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域,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对后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家、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都有不可忽视的深远历史影响。

3.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在中国

从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角度看,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深刻着历史的印记和探索的曲折艰辛。尽管深受曾在苏联教科书体系“梦魇”般地“纠缠”^⑨,但在中国,关于生产力的权威理解来自于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毛

泽东把解放生产力的思想运用到社会主义改造中,制定了一条发展生产力和改变生产关系同时并举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21]1}毛泽东给出的关于生产力的概念经过后期学者的简明化概括,最终被定义为“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具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同生产工具这两项,就构成社会生产力”^{[22]4}。我国的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沿用这个定义,并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中,展开了理论探索。20世纪50年代平心和张闻天的生产力理论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学者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对生产力理论的第一阶段研究,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1962年,于光远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力经济学”,探索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改革开放后,熊映梧是生产力经济学的创始人。1978年3月,邓小平在重新认识生产力范畴时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这一重要论断,不断贯穿落实在此后的全党重点工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中,生产力被定义为“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其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的重要因素,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23]132-133}。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科学生产力概念和生产力发展的伦理指向在理论深度和现实维度构成了现代中国生产力理论的思想根基,坚守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伦理定向,“人民性”始终都是中国生产力理论最鲜明的底色。

4. 共建“美丽中国”,同享“美好生活”:新质生产力的伦理向度

在百年大变局的新历史境遇下,直面世界之

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带来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新时期进一步推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依托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应时代发展所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是建设美丽中国,共享美好生活的动力源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需求,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好凝聚人心,共创美好生活的动力来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区别于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依旧是新质生产力概念内涵和发展理念的价值旨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必然要求,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具体体现,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导向,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是新质生产力伦理向度最为直观的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24]55}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贯穿于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当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

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以人民为原则,依托于高科技促成的高质量发展,创造的绿色生产力所指向的富裕与自由同向而来的未来不是“天赋人权的乐园”、不是“边沁的圆形监狱”、不是“韦伯的铁笼”,而是在青山绿水间诗意栖居的“自由人联合体”。

四、结 语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自由同向而来”的启蒙话语让生产力蒙上了一层“唯灵论”的神秘主义色彩,与此相伴的是弯腰驼背,四肢畸形,麻木不仁的工人被献上祭台。相较于古典经济学的视而不见和铁石心肠,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则用唯灵论“生产力”对其进行遮蔽和美化,显示出其深刻的理论局限性和现实危害性。经由对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国民经济体系生产力概念反伦理本质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身体和精神的亵渎,敞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自噬性和周期性破坏力的现实根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提出了科学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从从事劳动实践的活生生的现实个人出发,将生产力概念从唯灵化的精神真空真正拉回到现实,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设定为生产力概念和科学发展质态的伦理内涵、终极目标的价值旨归。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应改革与发展所需提出的战略性命题,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和科学发展观是新质生产力概念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基石,在新的历史境遇下,新质生产力的历史出场有深刻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现实关切。

另外,作为新时代的新术语,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全方位的阐释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是,这种讨论和阐释必须要葆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深度和切中现实的关切力度,不仅要杜绝“造词狂欢”、谨防“概念空转”^[25],防止对新质生产力概念的理解和发展目标的设定堕入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仅看重物质财富的局限性,将新质生产力理解为一种实体性要素或物质技术力量,更要防止将新质生产力幻化为类似于国民经济学的抽象国家精神。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的伦理内涵和生产力发展的价值旨归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的伦理向度进行剖析,意在捍卫新质

生产力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为新质生产力概念阐释和发展目标指向清障除尘。

参 考 文 献

- [1]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北京:三联书店,1956.
- [2] 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 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M]. 李乾坤,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3] 莫泽斯·赫斯. 赫斯精粹[M]. 邓习议,编译. 方向红,校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4] 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 陈万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6] 李淑梅. 马克思对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批判及其意义[J]. 社会科学,2010(12):120-127.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1] 姜海波. 青年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5] 恩斯特·拉克劳,查特林·墨菲.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 尹树广,鉴传今,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4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18] 科恩.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M]. 段忠桥,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 [19] 乔治·莱尔因. 重构历史唯物主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 [20] 侯晓丽. 马尔库塞社会批判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2] 蒋学模. 政治经济学[M]. 10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23] 本书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 [2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5] 陈立民. 谨防新质生产力陷入“概念空转”[N]. 新华日报,2024-03-21(03).

Study on the Ethical Orienta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ity

HOU Xiao-li

(School of Marxism,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126, China)

Abstract: Productivity theory is the theoretical coordinat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ity constitutes the intrinsic ethical dimension of Marx's concept of productivity, which contains both profou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concerns. Through the exposure of the essence of 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nscendence of the immaterial nature of the productivity theory of German national economics as represented by List, Marx founded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productivity on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e place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in the dimension of ethical realistic concerns, and clarified

that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ity is the value proposition of the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The emphasis on the eth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productivit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value proposition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ity constitut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ideological source of the concept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the goal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as a new theoretical coordinate of 21st-century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ll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ity; weal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ethical orientation

【编辑 吴晓利】

注释:

- ① 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曾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5。
- ② 劳动并不是一个常识性的简单范畴,而是一个现代范畴。伴随着劳动力商品化和商品交换普遍实现及工业资本主义崛起,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现了工业劳动、农业劳动与商业劳动背后的共同实体:“劳动一般”(arbeit überhaupt),并用一个看似简单的“劳动”概念去指代所有增殖资本的活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将“劳动”诠释为“塑形”(formieren),第一个在现代性语境中将经济学的“劳动”提升为哲学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马克思超越并扬弃黑格尔,直面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二重性思想,找到了破解现代社会本质的关键支撑。详见:张义修.从“劳动塑形”走向现代性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重释[J].哲学研究,2013(9):18-24。
- ③ 舒尔茨使用生产力概念的德文写法是 productive Kraft /productive Kräfte,从词源上看是对英语 productive 的创造性应用,并赋予其德国特色的精神内涵。
- ④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自我持存的方式是“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自我续命的方式是:首先,为了克服危机,必须‘消灭大量生产力’,‘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其次,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最后,必须要殖民掠夺,夺取新的市场。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0,33。
- ⑤ 1839年初到1841年,21岁的马克思撰写了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异》。论文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伊壁鸠鲁原子论中的偏斜运动及其思想意义,转引了伊壁鸠鲁的一段话来表达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并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种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敞开着,这种道路很多,它们是便捷易行的。”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5-26。
- ⑥ 在马克思生前,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特点是同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作斗争,与他们的组织争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马克思逝世之后,斗争的特点发生了新变化,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力量的不对称上:一些修养有素的理论家、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集中攻击唯物史观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都是一些新手,在理论素养方面不是他们的对手,再加上这些人对唯物史观经典理论缺乏研读,写文章讲话就是一些套话,没有说服力,损坏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象,进而影响了党的事业。详见:冯景源.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理论贡献[J].东南学术,2020(4):26-36。
- ⑦ 当时恩格斯将经济(和生产力)决定论的出现视为马克思和他本人对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不够充分所致,他在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中这样写道:“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详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501.另见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致梅林的信,同上书,第553页)恩格斯的努力在卢卡奇看来并没有获得成功:“恩格斯在晚年曾作过坚持不懈(但徒劳)的努力,试图把机械的、庸俗的、错误的认识论的经济优先观(有人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引上辩证法的轨道:他试图防止这样一种观点,就是似乎任何社会现象都能从经济中‘作为逻辑的必然而推导出来’。”详见: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M].白锡堃,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274。
- ⑧ 普列汉诺夫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并不算是马克思的发明;马克思的真正贡献是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的这一发现,使得有关社会历史的解释有可能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植根在一个统一的基础上,从而形成了他所谓的“一元论历史观”。普列汉诺夫界定的这种“一元论历史观”也可被称作生产力一元决定论。详见: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2章[M].博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61。
- ⑨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用“梦魇”来形容传统意识形态对现实中人们生活的深刻影响。马克思这样写道:“一些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9)本文借用此来说明苏联教科书体系中的生产力概念对中国思想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